

耶稣会第一位华裔司铎郑玛诺墓碑再现

2018年6月下旬在北京市党委党校内新整理出的宗教文物中，再现了耶稣会第一位华裔司铎郑玛诺(Emmanuel de Sequeira, 1635—1673)的墓碑。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皆认为其墓碑佚失不存，仅存拓片。故郑玛诺墓碑的发现，不仅本身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而且更正了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现存墓碑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天主教华人传教士的研究空白。

郑玛诺，字惟信，广东香山人。1635年5月25日出生于澳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645年，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向耶稣会总会提议带领中国及越南北圻、南圻少年各一人前往罗马深造事宜，郑玛诺被选为候选人。罗历山从澳门出发时，即在澳门为郑玛诺施洗，并让其陪同前往罗马。他们经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果阿，经波斯到达亚美尼亚，最终于五年后到达罗马。1651年10月17日进入修院学习修

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外语等多门课程。不仅称其健康良好，又注明其教育程度为“文学士”。1653年秋入耶稣会，并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哲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多门课程，且一年毕业，在当时实属罕见。毕业后居留罗马，以华人身份教授拉丁文、希腊文法及拉丁、希腊文学，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其九年的留学生涯里表现优异，深得教内人士赏识，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称其“是为耶稣会华人晋司铎第一人”。随后在罗马攻读神学期间，他首次明确提出教会本地化问题，对日后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开拓有着重大影响。



郑玛诺墓碑拓片

1666年4月15日郑玛诺从里斯本出发返华，行前受到葡萄牙国王的接见。其间曾滞留于果阿传教，最终于1668年8月19日到达澳门。杨光先仇教案件平息后，1671年，郑玛诺奉康熙上谕，与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 1639—1712)、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 1624—1684)二人入京。然而郑玛诺身患肺病，加之水土不服，病情加剧，最终于1673年5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38岁。在他去世后，安文思上书总会长，非常痛惜郑玛诺神父的逝世，认为郑玛诺确为华裔传教士的光彩与荣耀。

郑玛诺墓碑材质为房山白，墓碑高1.37米，宽0.68米，厚0.19米。螭首较为完整，流云纹饰，篆额天官为天主十字，外有如意纹环绕，规制精美。其碑身四周并无边饰。碑身残缺，下方被凿为榫状。拉丁文缺失严重。碑阴部分碑首亦为流云纹饰，篆额天官为拉丁十字架与耶稣会小写“ihs”所构成的“寿”字，凸显出中西墓葬文化的

交融。碑身部分为典型的耶稣会徽标志，外为方形边框，四角有祥瑞花卉。两侧嵌有金属条，已氧化生锈。



郑玛诺墓碑现状

碑文内容如下：
耶稣会士郑公之墓
郑先生諱瑪諾，號惟信，中國廣東香山人也。自幼入會其修。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壽三十八。

碑中拉丁文译文：
郑玛诺神父，来自中国澳门，年幼时前往罗马，入耶稣会。他是耶稣会中第一位华裔神父。出色地完成哲学、神学学业后返回中国，向同胞们传播福音。1673年5月26日逝世于北京，享年38岁。

郑玛诺墓碑拉丁文和中文部分相比较，拉丁文较为详细，强调了他在欧洲的游学经历。郑玛诺在国外不仅学有所成，海外教学，而且还加入耶稣会，成为华裔第一位耶稣会士，在教会内获得了非常高的名望。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称赞他“自幼往西国罗马京师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文学。深于音乐，辨析微茫”，并且提及郑玛诺的哲学、神学成绩优异。在1665年葡萄牙耶稣会名册中也盛赞他“天资颖悟”“有进步”等。而他回国以后辛勤传教，广播教义。当时他在澳门时，曾上书耶稣会总会长，言及“过去不愿录用中国司铎。在此紧急关头，非本国司铎，不足以挽救危局。据余判断，此事如不迅即付诸实施，已往传教事业将尽成泡影”。而他对于在华传教事业的关切以及培养华裔神职人员的呼吁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回应，陆续出现了前往海外留学的华裔学生，他们在回国后成为天主教本土化的中坚力量。

(陈欣雨)

中国铁道博物馆里的“文化年”

春节期间，中国铁道博物馆以“弘扬传统文化：铁博里的文化年”为主题，为观众精心准备了新春展览、科普讲座、民俗手工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超过1.2万名观众走进博物馆，过一个有内涵的“文化年”。

具有年味的灯笼、中国结、春联福字将三个展馆(正阳门展馆、东郊展馆、詹天佑纪念馆)装扮得“年味”十足，喜气洋洋，由博物馆员工装扮的“年娃”“春妮”人偶也在展厅里吸引了众多小朋友与之合影。

正阳门展馆推出的新春展览拉开了铁博文化年的序幕。“铁路春运摄影展”通过一幅幅春运老照片，使很多观众驻足回忆起曾经乘坐“绿皮火车”的春



火爆的“火车雕版印刷”活动

民生活带来的便利点赞。“中华春节符号”文化展览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对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的文化记忆。

“火车雕版印刷”是节日期间最受观众青睐的一项活动，三个展馆共开展活动50余场次。雕版印刷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高铁是我国新四大发明之一，这二者的结合给观众带来了新奇的感觉。东郊展馆推出的“欢度春节，灯灯日上”手工制作活动还将雕版印刷与传统灯笼制作结合，用印刷出来的火车作品制作出一个个火车小灯笼，让观众既体验中国传统印刷文化，又感受火车的魅力。

(马若泓)



明星小小讲解员魏蓝天进行“铁路科普小常识”讲座

詹天佑纪念馆举办了“翰墨飘香·迎春送祝福——书法体验活动”。一张张“福”字，一副副对联饱含了浓浓的中国的韵味，在这寒冬为游客带去了来自铁道博物馆的温暖和祝福。

春节期间，中国铁道博物馆志愿讲解团队也在正阳门展馆隆重登场，为观众带来了40余场铁路文化科普讲解。我馆的明星小小讲解员——8岁的王宇哲和10岁的魏蓝天更是以丰富的铁路知识、娴熟的讲解技巧获得了大量观众追捧，由他们带来的“铁路科普小常识”讲座，贴近群众生活，具有铁路出行“指南”的作用。

北京文物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双月出版)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8—L0023号
◆2019年第1期(总第261期)
◆2019年2月28日印刷
◆印数：2000份

博物馆里过大年，文化盛宴进万家——北京地区博物馆多项活动丰富节日文化生活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市文物局引导北京地区博物馆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组织开展第十届“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丰富首都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提升文化自信，传承家国情怀，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今年的“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时间长、热点活动突出，共计推出147项展览和活动，开展互动和教育42项160场次。仅以春节假期统计，博物馆共接待服务入馆观众148.5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其中市文物局属博物馆接待观众20.7万人次。

一、展览和活动贯穿整个假期，持续不断

今年的“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辞旧迎新 鸣钟祈福”拉开序幕，时间跨度从元旦至元宵节，持续时间长达50余天。首都博物馆在元旦当天开展了“新的一年，从首博开启”活动，在正式开馆之前，馆长走到大门外，为等候参观的观众送去新年祝福，并向他们赠送了《极简北京史》一书。此后，各博物馆的活动陆续铺开，整个节庆期间持续不断，一些博物馆的展览将持续到3月份。

二、传统节日氛围浓厚，热点活动突出

首都博物馆的生肖文化展已经持续了10年，一直是“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的打头展览和品牌项目。1月29日，首都博物馆选取60组(件)文物策划推出了“家和年丰——猪年生肖文化展”，带领观众了解生肖猪和人的关系、对人的重要意义。通过介绍生肖文化、年节文化，向观众传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和万事兴、和谐圆满的观念和追求。

此外，正阳门管理处的京津冀系列民俗文化展、

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的民俗系列展览、老舍纪念馆的“老舍笔下的春节”系列展览和活动等都是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今年正阳门管理处举办的“灶福桑梓 荫泽一方——京津冀系列民俗文化展”向社会公众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展示民俗风情，介绍文物背后有关灶王爷的故事。这也是2018年中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发展协议正式签订后，京津冀中小博物馆首次在协议框架内的展览合作。

故宫博物院于1月6日起在午门展厅举办“贺岁迎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并在正月十五、十六首

开夜场，举办“上元节之夜”。“故宫过年”成为2019年北京城里的新年俗。该展览分为文物展览和实景体

验两部分，共展出文物885件(套)。实景体验部分囊括整个紫禁城开放区域。在宫门入口悬挂着寓意吉祥的春联、门神，在乾清宫和皇极殿的廊下装饰着华丽的宫灯，在乾清宫的丹陛上下竖立着高大的天灯、万寿灯，总共使用仿制品超过1000件，整个故宫博物院都成为文化展示的场所，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

三、区博物馆活动侧重群众参与性和体验感，成为本区域常驻居民春节文化活动的“主角”

各区博物馆充分发挥区域文化中心的职责，举办诸如“红红火火过大年，欢欢喜喜闹元宵”迎春特别活动、“民俗博物馆第十八届北京民俗文化节”“红楼文化庙会”“新年新希望，猪年话吉祥”“博物馆内过大年——寻宝游”“画京剧脸谱 感受国粹魅力”趣味体验、“年画·话年”版印年画体验、“感受民间艺术”趣味剪纸体验等，用展览和活动诉乡情、传承传统文化，让观众在博物馆里度过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春节。

上宅文化陈列馆参与了北京市平谷区第三届京津冀文化庙会，用13块展板、两个全息影像和两个智能机器人向游客展示新石器时代的上宅文化及代表性器物——鸟首形陶柱、石磨盘、石磨棒、火种罐等，并在规定时间内安排集中讲解，5天时间里共接待游客26万余人次。



孩子们在首都博物馆认真聆听展览讲解

四、行业博物馆突出特点，举办独具特色的活动

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春节、元宵节文化活动，以始自宋代皇家园林中的《岁朝图》贺岁主题为主线，通过主题绘画作品及插花作品展示，展现传统园林园居生活中的艺术文化，引导观众感悟园林中的“美好生活”。

北京汽车博物馆举办了“创想汽车城——开往幸福的节日专车”春节特别活动，呈现传统文化与汽车科技的饕餮盛宴。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赏火车，猜灯谜”，北京天文馆的“八星迎宾”等活动都极具本馆特色。

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的“金猪拱福——2019猪年新春生肖文物联展”，从历史、艺术、民俗等视角，以百余幅文物、艺术品、珍贵标本的图片为载体，讲述猪的故事，以及古今人们对于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向往。

五、组建文博小分队，开展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

按照市委宣传部“文化进万家”的工作要求，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局文博小分队，分别由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等具体实施，策划推出传统文化进社区的活动。具体包括宣讲老北京历史及春节民俗、体验非遗进社区、“奥运说”科普团宣传2022年北京冬奥会、新年书画互动体验、竹筒书法讲座等。春节前共进社区开展活动10余场次。

为保证2019年“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宣传效果，市文物局宣教中心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介，以“博物馆里过大年”为题及时准确地报道相关活动内容，进行多层次的宣传，共计104次。

春节前，市文物局还印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假日服务接待工作的通知，明确各博物馆是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馆按照中央及北京市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假日服务接待工作，切实保障假日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2019年春节假期期间，北京地区博物馆推出的各项活动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文化盛宴，为广大市民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喜好人群的需求，达到了预期目标。

(文字：李 阳；图片：市文物局宣教中心)

浅谈明宫三种侍卫军伍甲胄兵仗

明代宫廷侍卫部队中有三千营红盔、明甲将军及五军营又刀围子手诸军，各以其所佩甲胄兵仗命名。这些军士的佩服光耀粲然，独具特色，用以凸显天子朝廷威仪。笔者结合文献记载及图像资料，试对红盔、明甲、又刀围子等军伍的形制与工艺做简要介绍和讨论。

1. 红盔

据万历《明会典》，明代工部下属有军器局及兵仗局两大军备制造衙门。其中军器局每年例造盔甲、佩刀三千六百件，其余长枪火炮不等，而兵仗局专门成造修理“上直围子手、锦衣卫官旗、将军”兑领的盔甲、军器。故可知红盔、明甲将军及围子手的甲胄亦由军器局督理，这一点可以在被魏忠贤陷害致死的兵部右侍郎何士晋所著《工部厂库须知》一书中得到印证。所谓红盔将军的甲胄，系“红漆皮盔及衬盔，青布绿穿甲”。“红盔”与“青甲”相配，或仿天、地之色，抑或应朱明火德

之象。依《工部厂库须知》，修理红盔用黄丹、桐油、藤黄、水花朱、无名异、水胶、光粉、白棉等物料，可知红盔系由各类红、黄色矿物染料混合浸染皮面而成。又青甲修造物料有乌梅、细三棱白布、粗棉布、白硝、高锡、废铁、熟建铁、松香、生挣牛皮、青白棉线、青布等，知其为基本的布面甲形制。

2. 明盔明甲

明代的明盔系尖顶形制，而《菽园杂记》又有“明铁介冑”的记载，所以明盔甲系铁制，又被打磨至泛白色光泽。实际上，红青盔甲、明盔明甲并非由三千营侍卫军伍专有服饰，在正德《明会典》中，侍卫部队中锦衣卫大汉将军有着金盔甲、红盔青甲、明盔甲等诸色甲胄者，又刀围子手亦服红盔青甲。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警入蹕图》混杂绘制大量装配类似甲胄的骑士，不易辨认队伍所属。此外，明盔、明甲虽为“仪卫中之不可缺者”，但在普通军队中广泛应用，据《小司马奏草》所载奏议，山西一镇即“合用明甲共七千三百八十九副”。如国家博物馆珍藏的《王琼事迹图册·经略三关》及《平番得胜图》中绘有着白色明盔或全套明盔明甲的军士。不过，侍卫明甲例用红色及绿色踞绸织缝，何士晋称其“工料最钜”，装饰性非一般实战甲胄可比。所谓“踞绸”，即山西潞安府出产的高级绸缎，以色泽艳丽著称当时。

3. 围子 五军营叉刀围子手所组成的“围子”，泛指层层环绕摆列的军伍。“围子”作为宫廷仪卫之一



《出警入蹕图》中所绘装配类似甲胄的骑士

种滥觞于宋代。《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便反映宋代宫廷仪卫奉宸队中设有“围子”，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的朝廷仪仗中也有“控鹤围子队”等军种。而明代作为侍卫的五军营叉刀围子手乃直接承袭自永乐北征部队。永乐最后一次扫北时，将“各周二里”的长围置于全军营阵的最外层，这种设置的意图明显是为了抵御蒙古

骑兵的冲击。至景泰三年（1452），兵部精选围子手三千，“操习武艺，以备随侍车驾”，至此，围子手正式列入明代宫廷侍卫行列。围子手所装备之“叉”，即戟把，系三叉头长杆兵器，也是用于挑刺敌方战马，其形制见于明末茅元仪所辑《武备志》中。又据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明廷大朝时五军叉刀官军列于奉天殿丹墀四隅周边，临近奉天门，属大殿最外圈；而常朝时围子手列于金水桥南北，亦属宫殿外围。这种列阵基本上仍模仿了围子手作战时在军阵外层守卫的状态，反映出其由战斗部队向侍卫部队的转化。正德年间编定的《明会典》中明确了叉刀围子手有三千之众。但因朝会列队时距离御座较远，所以实际常排在其他侍卫部队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显卿宦迹图》中第七开《皇极侍班》有较清晰的围子手形象，可资参看。

（秦博）



《王琼事迹图册》中所绘白色明盔的明代军士

明英宗颁赐法海寺《大藏经》敕谕碑

京西模式口是石景山区唯一一处历史文化保护区，古迹甚多，底蕴深厚，尤其是寺庙数量居于京西古村落之首。如今，这里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为法海寺，一为承恩寺。与承恩寺一样，法海寺也有一通敕谕碑，但不是护持庙产，而是护持皇帝颁赐的《大藏经》。

法海寺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竣工于正统八年（1443）。由御用太监李童出资，并向宦官、朝臣、汉藏两族僧侣等广泛募集资金，在龙泉古刹的遗址上兴建。殿堂布局华丽严谨，遵守伽蓝七堂之制，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明英宗钦赐寺额“敕赐法海禅寺”。正统十年（1445），英宗御赐法海寺《大藏经》一部，并颁发“敕谕”，永充供养。于是，法海寺僧人在药师殿之后建造藏经楼一座，用以保存《大藏经》，同年在楼前树立《敕谕》碑。碑文如下（标点及括号内字为笔者所加）：

皇帝圣旨：朕膺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法海禅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诵，上为国家祝庆，下与生民祈福。毋得敬奉守，不许纵容间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毁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故）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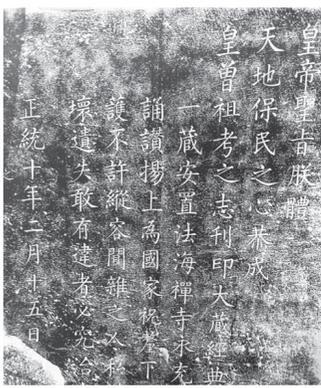
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

此《敕谕》以“皇帝圣旨”为首题，以“（故）谕”

结尾（“故”字疑为镌刻者遗漏），落款年月依稀可见识以“救命之宝”，属于当时皇帝颁布此类文书的一种固定格式。

正统年间颁发《大藏经》属于朝廷大事，获得的寺庙不止法海寺一家。据《宛署杂记》记载：“大隆善寺赐经一藏。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颁。皇帝圣旨：朕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崇国寺，永充供养……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毁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故谕。”

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弘法、译经以及对佛教的阐释越来越丰富，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和众多高僧的不懈努力，终于形成了一部浩大的丛书，即“一切经”，也称“大藏经”。木刻本《大藏经》最早出现在宋代开宝年间，也就是《开宝藏》，接着《契丹藏》《赵城金藏》《普宁藏》《碛砂藏》《高丽藏》等陆续涌现。到了明初，连续刊刻了《洪武藏》《永



颁赐法海寺《大藏经》敕谕碑拓片（局部）

乐南藏》《永乐北藏》，最著名的要数《永乐北藏》了。《永乐北藏》是在前述若干种藏经之后，由官方刻印的一种佛教《大藏经》，收录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译的佛典和中国佛教的著作共1615部6361卷，分装636函。它以6千字文为编号，为明以前佛教文献汇编宝库，字体俊秀，版式典雅，校勘较精，收录有明代特点，保有世界上最早流传的汉文佛藏目录。它的装帧也比《永乐南藏》更加考究精美豪华，绛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气派。一直是作为朝廷赐给各地寺院的经典供奉品。

《永乐北藏》鸿篇巨制，工程浩大，从明永乐十九年（1421）开始刻印，直至正统五年（1440）完成，历时19年。英宗为妥善保存，下诏颁赐天下名寺，大隆善寺、十方普觉寺（卧佛寺）、大觉寺、法源寺、法海寺等北京少数几座寺院在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荣幸得到了这部皇家《大藏经》，昭示了当时法海寺在京城寺院中的极高地位。笔者认为，法海寺在建寺之初幸得到英宗亲颁的《大藏经》，可能与一些级别较高的藏僧建寺、驻寺有很大的关系。

（苗天娥）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 ◆ 文博要闻：文博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 ◆ 来稿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 投稿邮箱为：bjw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关于“江口沉银”特展策展的思考

2018年6月26日—9月23日，“江口沉银”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价值，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和晚明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其次，“江口沉银”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明末张献忠曾“沉银”在此，揭开了“江口沉银”300多年的谜底。

笔者认为，如果换一下思路，根据出土文物设定不同的故事主线，运用一定数量的实体模型和技术手段进行形式设计，可能会为观众带来不同的观展体验。因此，笔者按照自己设想的思路将展览分为九部分，即“沉银”传说、彭山大案、“沉银”出水、晚明动荡、猷忠起义、江口之战、江口“沉银”、江口保护、结语。

第一部分：“沉银”传说。这部分是展览的序厅，在这部分中运用flash动画，整个序厅中只有一个大屏幕，屏幕中的动画内容是几个小孩在岷江河畔追逐嬉戏，边跑边喊：“石牛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从民谣的第一句到第四句声音逐渐减小，使观众感受到孩子们的声音由近及远，体现出脍炙人口的江口“沉银”这个传说。紧接着用一块展板生动地讲述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传说，这块展板连接着“沉银”传说与彭山大案这两部分内容。这既可以让观众知道“江口沉银”的出处，而且还能激发观众对此展览的参观兴趣。

第二部分：彭山大案。在这部分中，用三块展板分别介绍村民盗宝、文物贩卖和警方追查，从而说明5.1彭山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的来龙去脉。正中央摆放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和天启元年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一方面可以证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史实，另一方面还展示了追缴5.1彭山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的成果。进而引出第三部分内容。

在北京领略大美青海——“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

2月28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物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协办，首都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承办的展览“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在首都博物馆开幕。

青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远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生活在这里。沱沱河沿岸、霍鲁西里、昆仑山的三叉口和龙羊峡地区的黄河阶地，均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从青海东部宽广肥沃的河湟谷地到一望无际的柴达木盆地，都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其间。小柴旦湖遗址、贵南县拉乙亥遗址填补了青海新发现的西藏尼阿底遗址，共同构成人类征服

第三部分：“沉银”出水。主要展示江口古战场考古发掘的情况，此次“江口沉银”特展中最后一部分的“沉浸式投影”视频纪录片《江口沉银》可以放到这部分中，将张献忠“沉银”的木鞘实物也放入“沉浸式投影”观影区域中，使观众结合视频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江口沉银”真实存在的事实。这一部分考古发掘成果的展示进一步佐证了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真实性。

第四部分：晚明动荡。该部分作为过渡，不作为重点展示，主要突出如下几点：1. 时局地图，展示当时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通过地图说明当时明、清及各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对比。2. 册封金册，通过展示册封金册说明明朝的册封制度，进而说明当时各地藩王过着腐败的生活、欺压农民百姓，促使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从而引出第五部分内容。

第五部分：猷忠起义。此部分将整个展览逐渐带入高潮，在这一部分中分为两段，第一段为反明起义，通过张献忠起义的行军路线图展示张献忠起义的全过程，还要以视频的形式形象地展现张献忠起义的战况。第二段为建立大西。首先展示出国博的馆藏一级文物，即“骁右营总兵关防”铜印和《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说明当时大西的军事制度。紧接着展示“西王赏功”钱、刻有“大西”年号、不同税种的银锭，通过展板向观众介绍大西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内容。而且还要通过刻有“大西”年号、不同税种的银锭说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观众结合展板上的相关信息观看展品，可对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六部分：江口之战。首先在展厅中央摆放一个描绘江口之战战况的沙盘模型，目的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当时江口古战场的地势，还能让观众看到当时江口之战的战况。之后展示江口之战所用的兵器，如三眼火铳、铁刀、铁矛、铁叉、铁箭簇、铁蒺藜等，并介绍各种兵器的用途。在这一部分中要加一些凸显

战争场面的声音效果，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江口之战的惨烈程度。

第七部分：江口沉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艘古战船的实体模型，背景墙用一个电子显示屏进行动画展示，展示的内容是滔滔不绝的岷江，古战船“侧翻”在岷江中，地面上的电子显示屏展现的是大量的金银财宝落到岷江中，有的随岷江飘向远方，有的逐渐沉入江底，此实体模型展示的是一个江口之战战后的场景。紧接着展示此次在江口古战场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如大量的金银币、戒指、发簪、手镯、耳环等。这部分是整个展览的高潮部分，充分说明了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事实，也通过展示出土文物进一步让观众了解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与变革。

第八部分：江口保护。首先展示大量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图片、高科技的考古设备，从而说明此次江口古战场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其次通过图片和文字向观众展示今后如何对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保护，如何进行新一轮发掘、建设博物馆、建设遗址公园等，旨在增强公民对文物和古代遗址的保护意识，让观众认识到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第九部分：结语。包括江口“沉银”的发现对学术、社会和民众的意义，还要说明此次展览的教育意义——保护文化遗产，使观众们认识到文物对于一个民族发展与延续的意义。

史书上对张献忠是否在江口“沉银”，始终是众说纷纭，江口“沉银”这个传说在四川流传了几百年，所以江口古战场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被后人讲述。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充分地证明了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史实，因此通过对文物逐渐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挖掘出江口“沉银”背后更深层的故事，进而通过展览向社会传播江口“沉银”的故事。

江口“沉银”内容丰富，不同的策展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江口“沉银”的故事，不同策展人的角度不同进而使展览实现不同的展示效果。上述仅作为笔者在观看“江口沉银”特展之后从不同角度对该展览策展的思考。

（解铭瑶）



水、路，是演绎青海厚重历史的舞台，因其始终是纽带和节点，统治者的目光总爱越过青海的河谷峻岭，其思绪或盘桓在条条古道的尽头，或追随滔滔东去的河湟之水。展览共分

“源远流长”“汉风羌道”“吐谷浑国”“吐蕃东进”“海纳百川”“视频介绍”6个单元，共展出文物400余件（套），以青海历史发展为主线，以农耕与游牧的大视角切入，展示青海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在每部分中单列出青海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内容，展现一带一路中的青海所蕴含的文化交流信息。

展出的文物中既有精美的彩陶、早期铜器，也有特色显著的金银器、丝织品，还包括大量的宗教艺术品，每件文物都突出了“青海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组成”这一主题，向观众呈现青海的独特人文风貌与生态景观，集中展示了丰富、厚重的青海历史文化！（《北京文物》编辑部）

